

中国人80年代前不知南京大屠杀

12月13日,南京大屠杀76周年纪念日。烛光祭、守灵仪式、世界和平法会、国际和平集会,幸存者赴日证言……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显示这一主题日益受关注。

但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,当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研究南京大屠杀时,却面临着窘境。她到南京采访时,没有看到大屠杀遗址。张纯如观察到的事实,正映射了这场旷世灾难的命运:在公众视野中,它曾长期“消失”。

“老师不讲,教科书不提”

解放后30多年,南京大屠杀曾在国内教育中长期缺失。

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,曾是“文革”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。“可以说我一直 在南京求学,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,教科书也不提,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。”

1938年1月,刚刚创刊的《新华日报》曾多次报道了南京大屠杀。后来情形渐渐发生改变。1948年11月解放区的光华书店出版的《中国抗战史讲话》,也介绍了南京大屠杀,不过重点落在揭露国民党军队的逃跑,“在南京就采取逃跑主义,不战而逃。”1949年7月山东新华社

店出版的《从“七七”到“八一五”》,则没有涉及这次浩劫,而是对比国共的抗战表现。1957年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的《“九一八”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》和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《抗日战争史话》,“南京大屠杀”都没有出现。

“在社会上,那些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或受害者也不敢讲,不让他们讲。”经盛鸿介绍,在学术界,1949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30多年里,对南京大屠杀几乎没有研究。

“南京好人”遭遇

南京大屠杀之前,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走了,但有20多个英、美、德等国的侨民留下来了,包括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的外教。“这些人基于人道主义精神,以中立国人士的身份,力所能及地抗拒日军的暴行,为救助几十万难民做了大量贡献,被南京难民称为‘救命菩萨’、‘南京好人’。但在解放初‘反美、仇美’的思想政治运动中,这些人 都被批判了。”经盛鸿介绍。

张纯如发现,朝鲜战争时,中国报纸将南京的美国人描述为帮助日本人进行

屠杀的恶棍,还有文章指责南京沦陷时安 全区外国人将南京城拱手让给日本人。

经盛鸿介绍,在南京保卫战中,很多国民政府军人牺牲,其中最少有九位将军,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有几万人“但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国民政府军人,和在日军大屠杀中被杀害的国民政府军人,在建国后却被打成‘历史反革命’、‘反动军官’。”

经盛鸿介绍,“文革”时提出“三个世界”理论,日本属于第二世界,被认为是可以争取团结的对象“在这个背景下,只能揭露美帝国主义的‘侵华罪恶’,而不可能深入追究日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罪恶。”

重回公众视野

上世纪80年代,南京大屠杀终于重回公众视野。1982年是一个节点。

当年7月,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,把“侵略华北”和“全面侵略中国”等段落中的“侵略”改为“进出”,把南京大屠杀改为“占领南京”。中国针对教科书事件向日方正式提出交涉,《人民日报》也发表了《必须牢记这个教训》的评论。此后,中方展开调查。

1984年2月至6月,官方首次有组织、大规模地调查南京大屠杀,发现了幸存者、目击者、受害者1756人。

1985年8月15日,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,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开放。此时距南京大屠杀已近半个世纪。

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亦命途多舛。

马庭宝的父亲在1937年的大屠杀中遇害时,马庭宝只有两岁。他目前主要依靠每月的1000多元退休工资度日。他说,解放后至上世纪80年代之前,南京大屠杀没有被公开提起过。解放后很长时间,他作为幸存者未获任何政府援助。

直到2004年——南京大屠杀67年后,马庭宝收到了南京市民政部门的第一笔援助金,一年500元,该援助金目前增加到了 一年1400元。

时至今日,对南京大屠杀的介绍正不断深入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,一块 颇长而沉重的黑色大理石,上面用各国文字写着:“遇难者300000”,最开始用3种文字介绍,如今发展到了11种。

《南方都市报》2014.2.9 文 / 高龙

全国人大第一张反对票是谁投的？



1988年3月28日,人大代表黄顺兴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,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不同声音。

黄顺兴的政治生涯,是在海峡对岸开始的。他是台湾彰化县人,生于1923年,是一位农业专家。1950年代投入台湾民主运动,在国民党戒严期间,他通过竞选,三任台东县议会议员、两任台湾立法委员,因敢于直言得名“黄大炮”。1964年以无党派身份当选台东县县长,因亲近农民,又有“平民县长”之美誉。第三次竞选立法委员失败后,去了日本。1985年来到大陆,受到中央领

导人的高度重视。据胡治安在香港出版的《统战秘辛》一书介绍,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6年10月9日与他会见,希望他在人大或政协正式发表意见,参加国家政治生活。经中央书记处书记仲勋批准,决定提名黄顺兴为全国人大代表,由湖北省选举。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向黄顺兴说明了这一打算。黄顺兴说,这样不行,我不是湖北人,又没有在湖北工作过,怎么去当湖北省的人民代表?局外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“安排”。我当人大代表,应由台湾同胞选举。当“安排”的人大代表,会影响我在台湾同胞中的形象。中央接受了黄顺兴的意见。后来由台湾代表团选他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,并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。

1988年3月28日,七届人大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,在通过七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时,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:“我反对!”他讲了反对的理由,主任委员周谷城先生学问很高,我非常钦佩,但他89岁了,这么大岁数的人,不应该再辛劳他了。难道就没有年

轻人为国家做事?发言完毕,全场响起热烈掌声。虽然周谷城还是当选了。但这是自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,第一次公开出现了反对票,黄顺兴开启了历史的新一页。

1988年,黄顺兴还提议设立代表秘密投票处。因为投票的代表座位挨得很近,投票的结果邻座都能看到,侵犯了代表的权利。他的建议立即被采纳。原来全国人大没有大会发言这一项。黄顺兴提出,不管小组讨论怎么样,大会是全体代表沟通的最后一个机会,这个权利不可剥夺。这一条也写进了人大议事规则。在人大常委会,黄顺兴还提议,允许记者进入大会会场采访。当时,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接受了他的意见,开放了记者室。

1992年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,黄顺兴又要求公开发言,表达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,没有获准,因而退席。他还是感到对大陆的政治生活不适应,于1993年辞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。2002年,黄顺兴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,享年79岁。

人民网 2014.2.28 文 / 丁东

“东突分子”披露终极目标

近年来,在我国境内外的“东突”势力为实现建立所谓“东突厥斯坦国”的目的,策划、组织了发生在我国新疆和有关国家的一系列恐怖暴力事件,严重危害了我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,并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了威胁。

据不完全统计,1990年至2001年,境内外“东突”势力采取爆炸、暗杀、投毒、纵火、袭击、骚乱及暴乱等方式,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200余起暴力恐怖事件,造成各民族群众、基层干部、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,440多人受伤。……2002年后,“东突”势力又先后在新疆境内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。截至2009年7月17日,造成197人死亡(其中绝大部分是无辜群众)。

1992年2月5日,乌鲁木齐市52路和30路公共汽车相继发生炸弹爆炸,这起发生在当年春节的系列汽车爆炸案共造成3人死亡,9人重伤,14人轻伤。

事隔5年之后,1997年2月25日,恐怖分子又在乌鲁木齐10路、44路、2路公共汽车上再次制造了一起公共汽车爆炸案。

制造这两起汽车爆炸案的是一个名为“东突伊斯兰党”的恐怖组织。

记者:制造这个爆炸案的目的是什么?

“东突”恐怖组织成员伊卜拉音·托乎提:当时杀他们的目的,具体我不清楚,我作为下属只能是服从命令、听指挥,他们让我干啥,我就干啥。

记者:你知道“9·11”恐怖事件吗?

伊卜拉音·托乎提:听说了。

记者:如果你的头儿让你去做这样的事,你也会去吗?

伊卜拉音·托乎提:因为当时按照自己的想法,头儿让干什么,我们就得去做什么,所以我有可能去干。

1996年5月,喀什市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主持、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、已经70多岁的阿荣汗·阿吉,在自己家门口被恐怖分子砍成重伤。

记者:为什么要那么仇恨阿荣汗·阿吉呢?为什么要杀他呢?

“东突”恐怖组织成员阿吾提·马吾提:当时我们认为他是宗教败类,他背叛了宗教,我们要纯洁宗教,所以我们一定要杀掉他。

“东突”恐怖组织成员亚生·阿卜

拉:当时我们抱的态度和思想,就是最终成立伊斯兰政权,当然反对和阻碍建立伊斯兰政权的任何势力,它们都是被攻击的对象。

1996年,为制订恐怖分子的培训计划,确定严密的组织体系,“东突”恐怖组织在和田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。

“东突”组织成员亚生·阿卜拉:当时我们规定说,加入组织的人一切都服从命令,听指挥,不能擅自行事。如果有人违反纪律,要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处罚。

“东突”伊斯兰运动不仅在本·拉登的资助下训练恐怖分子,而且还直接参与了阿富汗内战,车臣战争。

记者:你在车臣打仗打了多长时间?

“东突”恐怖组织成员阿卜力克木·库尔班:5个月,参加了20多次战斗。

记者:你跑到车臣去帮杜达耶夫他们打仗,那如果有朝一日,按照你们的计划,当需要为自己打仗的时候,你觉得车臣人会来帮你吗?

阿卜力克木·库尔班:当时我们五六十人住一顶帐篷,他们说只要你需要,我们一定会去。

摄 焦点访谈》

《血战台儿庄》打动蒋经国

1938年1月下旬,侵华日军开始南北对进,夹击徐州。在1月至5月间,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12个集团军约60万人防守徐州,与日军进行了抗战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会战。其中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这次闻名中外的大会战的关键环节,这就是著名的“台儿庄大捷”。

1986年4月,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《血战台儿庄》在香港举行了首映式。“台湾中央社”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在看完影片后,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,说:“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,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,名叫《血战台儿庄》,里面出现了‘先总统’(指蒋介石)的形象,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,这次形象是正面的。”

在电影《血战台儿庄》中,蒋介石的这个正面形象最主要的就是这样 一个情节:国民党师长王炳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,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,这时候天空上有日本侵略者的战 机飞来扫射轰炸,面对危险,蒋介石临危不乱,发表讲话,镇定自若。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。蒋经国听说后,很是震惊,马上对谢忠侯说:“找一个拷贝来看看。”

谢忠侯便马上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告知此事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当即批示:可以将此影片传至台湾。1987年7月,《血战台儿庄》的拷贝到了台湾。蒋经国收到影片拷贝后,立即组织了国民党中常委全体人员观看。看完影片后,蒋经国若有所思地对大家说:“从这个影片看来,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,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。看来,大陆(对台湾)的政策有所调整,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才是。”宋美龄也接连看了两遍。不久,蒋经国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,这也是海峡两岸隔离32年后台湾首次开放在台人员回大陆探亲,两岸坚冰开始悄然融化。

《快乐老人报》2014.2.27

鲁迅与林语堂绝交内幕

鲁迅和林语堂原是意气相投的老朋友,两人曾同住 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。

一次,鲁迅不慎把吸剩的烟头随意一扔,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,竟把林语堂的蚊帐烧去了不小的一角。

林语堂将火扑灭后,心里十分不悦,便厉声责怪鲁迅。鲁迅觉得林语堂的火气太大,有点小题大做,太伤人了,便还了几句嘴:“完全烧了便怎样?一共也不过5块钱罢了!”林语堂正在气头上,当然不让,于是两人便争吵起来。

两人一位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“幽默大师”;一位是举世公认的“左翼文坛之雄”,竟然为了这事大伤和气,自此绝交。

《书报文摘》文 / 佚名